

# 负重任而走远道

## ——费孝通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思想启迪

汪 丹

**内容提要** 身处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逆流之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接过前辈知识分子“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接力棒,而且要迎面全球性“思维失效”的进退维谷,肩负起中国社会科学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以江村研究为线索,追溯费孝通先生由青年成长为具有世界前瞻力的大师的历程,可以看到费先生接续承继了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精神世界立足点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轴,并在“亲师取友”的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中获得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地持续不懈“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这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地接力与成长带来了启迪。

**关键词** 新知识分子 学术接力 从实求知 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汪 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200444

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凭藉对大时代背景下的国家民族与人文世界所面临的大问题地思考,构成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鲁迅、梁漱溟、陈寅恪、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社会瘫痪、人心困顿与士风之变”<sup>[1]</sup>的艰难中,殚精竭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问题并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知识范型”<sup>[2]</sup>。而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与费先生所代表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对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与思想主轴地承继中,以推陈出新的理论思维和立足中国之“实”的实践探索,有力地回应着时代变革中面对世界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向与“文化主体性”<sup>[3]</sup>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接过几代知识分子“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接力棒,在今天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的逆流中,迎面全球性“思维失效”的进退维谷,肩负起中国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sup>[4]</sup>,这场既要承继又需创新地知识分子接力的基石是什么?以费孝通先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藏彝走廊白马藏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项目批准号:14CSH035)阶段性成果。

[1]魏文一:《“刚”的人生态度与新知识分子——梁漱溟早期论中国文化的路向》,〔北京〕《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710.html>。

[3]李友梅:《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李友梅:《中国社会科学如何真正从“地方”走向“世界”》,〔上海〕《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生的江村研究为线索,追溯费先生由青年成长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立足点与源动力,能为当代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力与成长带来启迪。

## 一、开悟与立志:“费孝通问题”的立足点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有质量地思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仰赖于有效地发问做指引和能将发散思维融汇合一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即是理论思维的起点,其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而理论创新的过程可视为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治学精神与旺盛学术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就在于费先生总是能够直面社会转型之大问题地挑战来思考,并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及其变迁进程中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尽管费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问题不断地发生转换,但其从未偏离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后辈学者将这一核心问题又称为“费孝通问题”。

“费孝通问题”不是费先生的个人追求,而是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今天我们仍在这追问之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盛极而衰、积贫积弱而备受列强欺凌,虽然当时的中国青年已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但中国学士的“学以致用”的老传统与民族振兴相联结,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的心理,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续传承精神世界的立足点。

展开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即是中国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社会变迁<sup>[1]</sup>,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叩问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费先生穷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合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sup>[2]</sup>。然而,我们却有意无意的将“费孝通问题”简单化,忽略了其内在的以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有志青年的思想成长过程,特别是对一代知识分子从思考方式地“开悟”到思想成长所栖居的变迁中的“人文世界”的复杂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又将“费孝通问题”个体化,而缺乏对其内核即几代知识分子共享与承继的精神世界的立足点与思想主轴的深入思考。简而言之,我们视“费孝通问题”为天然之物,而忽略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费先生从青年到优秀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印证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三代人之间的接续承继过程,而时势、家庭与师承构成了我们理解费先生有质感的思考方式与“费孝通问题”得以“开悟”的途径。“要了解一个人的一生,首先要从客观的历史来了解,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可能性选择,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就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要走的路。”<sup>[3]</sup>

费先生出生于清代末年,成长于民国时期,其出生与成长所居的“人文世界”,是一个“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出来的文化”<sup>[4]</sup>,这正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这一代人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sup>[5]</sup>,费先生的家族亦是最早受到这一文化影响的“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中接受西方文化的代表”<sup>[6]</sup>。

[1]金耀基:《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上海]《文汇报》2009年11月2日。

[2]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费孝通、方李莉:《早年生活与文化熏陶——费孝通访谈录》,[南宁]《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4][5]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710.html>。

[6]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sup>[1]</sup>。费先生正是在这一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他早年接受的是与中国传统并未完全隔绝的新式教育,而其青年时代又负笈英伦接受了当时最为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因此从知识结构上来说,费先生是从旧时代里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1930年20岁的费孝通来到北京读书,是费先生一生变化的界石,从这时起费先生开始了以研究人文世界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方向<sup>[2]</sup>。那时的中国处在中西文化接触、碰撞的时期,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忧心于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费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势”中,从东吴大学转学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在学术论战及思想交流与交锋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的燕京大学,费先生结识了其学术前行道路上的众多良师益友,特别是在吴文藻老师的引领下走上了“到实地去”认识中国社会的学术之路。

费先生的老师这一代人如顾颉刚、吴文藻、潘光旦、冯友兰等一代人所开拓的精神,强调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社会文化变迁中发挥指导的作用。他们普遍追求真理、热爱科学,反对学术界不动思想、轻易信人和人云亦云的风气;他们抛却了“科学即是已存在的知识”的陈见,具备一股不断追求知识和“推陈出新”知识的冲劲<sup>[3]</sup>;在对知识更替的理解上,他们特别强调通过“教育”来培育可以“负重任而走远道”的知识分子接班人的重要性。在潘光旦先生看来,教育是青年人“开悟”的重要途径。所谓“悟性”,浅显而言是能从许多现象和事物中总结出一个道理的“推十合一”的能力,深入而言又是一个青年所恃以立身、处世、应变、救国的特性所自然流露出的“天生的朝气”。这是人生最可宝贵的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教育的效用首先在于其着重情绪和意志的培养,为朝气蓬勃的青年打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世的主意,教会其学通“忠恕一贯”的道理;进而,调节和维持一个人青年时期所具备的积极的热忱,使之不随年龄与环境变迁而俱变,由此促其人生道路上有余勇可贾能“负重任而走远道”<sup>[4]</sup>。

费先生老师的思想与理念,契合了青年费先生敢于怀疑、反抗教条的活泼思想和希望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地渴求。上世纪30年代,费先生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辈学生,在老师吴文藻先生的启发和引领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这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的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攻关的活动”<sup>[5]</sup>,这其中最主要的历史现实就是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西方新技术竞争之下陷入艰难和加剧贫困。

1936年,怀着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使命感的费先生来到中国长江流域的一个普通村落——开弦弓村,进行社会实地调查,其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江村经济》成为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sup>[6]</sup>。这一时期,还有如杨庆堃的《山东邹平的贸易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村地区的诉讼》,林耀华的《福州的族村》,廖太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黄石的《河北农民的风俗》,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了

[1]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广州〕《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

[2]费孝通、方李莉:《早年生活与文化熏陶——费孝通访谈录》,〔南宁〕《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3]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北京〕《读书》1993年第11期。

[4]潘光旦:《论“士”的教育》,《政学罪言》,观察社1948年4月初版。

[5]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上海〕《社会》1993年第7期。

[6]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现代文化进入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的过程,以及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生活方式所出现的种种问题<sup>[1]</sup>。与同学益友的志趣关怀相近,费先生的江村研究与增进也在与同一个时代中的人物的交往中,彼此切磋砥砺充满着学术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青年费先生的“开悟”和研究方法的确立以及“费孝通问题”的立足点,不仅是其所处时代和所栖居的人文世界的产物,更得益于近世中国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筑就的“亲师取友”的学术共同体与强调“学以致用”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作为新知识分子,费先生在“亲师取友”的共同体中培育了运用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学以致用”的人生态度,习得了走进中国社会的基层社区和投身于改善中国农民生活的“到实地去”的研究方法,也自此以“费孝通问题”的追问为导引,走上了一条在波折的人生际遇里不忘初心的“负重任而走远道”的人生道路。

## 二、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

费先生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制度始终处在激烈变动之中,费先生学问人生的每一阶段所处的历史情境、“时势”要求、人生际遇及需直面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但费先生始终坚持“到实地去”理解基层社会生活现实,在“行行重行行”中追问、反思、验证、超越与再追问、再反思、再验证、再超越的交替往复中贯彻“从实求知”的学习方法与学术研究路径。

费先生总结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并将其学术生涯总结为两个二十年,1930年至1949年是第一个二十年,1980年至1999年是第二个二十年,而后辈学者认为1999年至2005年费先生辞世是费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sup>[2]</sup>。自1957年—2002年费先生回访江村共计二十六次,1987年费先生三访江村后开启了“行行重行行”的脚步,并在其第二次学术生命来临时由关注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转向探求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问题。“行行重行行”不是简单意义的多次往返,其对研究者的实践与反思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它要求研究者充分尊重和认识社会生活中的民众智慧与“常理常情”,并能够就社会生活现实的变动不居有着更高层次的理解和反思。费先生一次次的重返江村,试图追问的是,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一轮轮的现代性来了,而我们基于的乡土性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正是以持续七十年跟踪式地参与观察得来的“江村经验”作为“参考体系”,费先生聚焦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命题提出了一系列紧迫时代的战略设想。

费先生在其学术生命的第一个二十年,所关注的是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其在《江村经济》的结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源一是土地制度不合理,二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三是外来势力和西方新技术的竞争加剧了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而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

费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伴随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得最快的时期,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1981年费先生三访江村,看到1978年以来在短短三年里江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就翻了2倍,人均年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在追问江村迅速富裕的原因时,费先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江村家庭副业得以恢复,集体小工厂得以兴办,农业、副业与工业组成了农村经济新结构,而其中发展前途最大的是工业,其“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sup>[3]</sup>。

江村在半个世纪内的变化,促使费先生进一步思考“工业下乡”的问题。1980年代初期中国各地

[1][3]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上海]《社会》1993年第7期。

[2]陈占江、包智明:《“费先生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小城镇复兴,费先生注意到家乡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而正是在追问集镇的兴旺的原因时,他看到了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条件,这些条件多依靠外力驱动,因此费先生决定从吴江县开始,自江村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城镇”的调查。费先生的小城镇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sup>[1]</sup>。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乡镇企业崛起与农民流动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费先生认为“乡镇工业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我把它称为草根工业”。“草根工业”的出现促使费先生认识到,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集体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条独立自主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的具体步骤和形式不可能完全雷同于任何时代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它必然有它特殊的形式<sup>[2]</sup>。1984年费先生走出苏南,进入苏北调查,看到了两地发展上的差距,进而走出江苏省在温州考察时提出了“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自此费先生一路走来,从内蒙古西行宁夏、甘肃,1991年走进西南山区;另一路走沿海各省,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合纵连横“下活全国一盘棋”。

费先生研究小城镇、城乡关系和区域发展、边区开发与现代化,支持乡镇企业改制和私营、民营企业发展,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等经济区域的建设思路,并从中看到了更能将中国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传统同现代化进程有效结合的“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内发型发展”道路。在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分析中,费先生以“全国一盘棋”的眼光,注重各地特色,将不平衡、差异性、历史性与多样性统合到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中去,即充分尊重基层民众文化习惯、生活方式和创造能力,而不强行移植各种现代化模式。临近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先生认为扎根于乡土的工业以及中国乡镇企业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并可以用这种模式“接受世界性的、现代化的挑战”。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全球化浪潮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来势汹汹席卷而来,不仅离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失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而且失地后的农民所赖以生存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凭依,传统虽然存在但却不再有效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费先生跟随着乡村变革的实践对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回答中国将如何在不丧失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同时,能寻找到一条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平衡的发展道路<sup>[3]</sup>。费先生在其“九访江村”时谈到,其盘算着的是“应及时抽回身去,重返故土,从头做起,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正是在不断的追踪与回溯江村的研究过程中,费先生将其观念的基础始终植根于具体而完整的经验世界之中,并不断升华出新的经验和新的生命,从而得以不断拓展着其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科学认识。而当我们追问费先生持续不懈地“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时,可以体悟到其所持守的“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情怀与信念。

“志在富民”是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早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的那日起,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就已经深刻认识到“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农村卷入世界经济链条,成为其最

[1]沈关宝:《迈向人民的田野——随师调查散记》,〔福州〕《福建论坛》2015年第6期。

[2]沈关宝:《〈小城镇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3]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先生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低端的一环,嵌在‘乡村-大小城市(镇)-通上大埠-世界’的体系中,这不仅加剧了中国农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而且引发了中国社会贫而更贫与生产能力根本丧失的危机”<sup>[1]</sup>。费先生的江村调查亦致力于说明当时“中国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sup>[2]</sup>,他从传统的养蚕业到现代丝织业,关注工业下乡的年代,如何才能让当地农民翻身,并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

费先生的江村研究和此后对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研究均由经济变革问题作为研究入手点,通过考察新的知识观念在乡村中的实践来看思想与社会的对话关系,进而讨论中国人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大问题。这一研究取向和其背后的方法论要追溯到费先生的老师们对其地指导和影响。吴文藻先生可以说是费先生的启蒙老师,他引领费先生踏进了人类学的大门。吴文藻先生为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综合比较了法国、美国、德国、英国社会学人类学前沿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理论作为理论主体,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为主要方法开创中国社会学的新时代。英国文化功能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是费先生的博士生导师,功能学派以文化结构为研究对象,不仅注重文化的整体性而且将文化密切地和人的生活挂钩,注重实地工作,强调不能离开研究对象的所在地进行推考。此外,潘光旦、史禄国和钱穆、梁漱溟、陈寅恪的思想都启迪并影响着费先生学术思想的成长。得益于老师们的思想启迪,费先生将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派克提倡的life history研究与乡村社区研究相结合<sup>[3]</sup>,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人类学中国化与文化功能论思想,始终坚持实地调查,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中获取知识。

费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还是研究者所接触的社会变动的反映,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而其总结自己思想的发展脉络时说,我这一个人求知的经过,都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知识的经过,看书、看人、看社会,自己身体力行的只有四个字——“从实求知”<sup>[4]</sup>。从这层意义上说,工业下乡、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人口蓄水池等主张都不是费先生的创造,也不是理论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实和中国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尽管如此,要在理解和辨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实际时,敏锐的在实地里发现问题,并能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间,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sup>[5]</sup>。

研究者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实际,总能获得正确的权衡与深切的体会,实则是一种基于本土“从实求知”的能力,这不仅需要研究者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又离不开研究者对“从实求知”这套认知架构内涵的知识底蕴进行理解、反思与建设的过程。因为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涵盖了研究者对过去的经验、目前的形势的了解以及对未来结果的期望。但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sup>[6]</sup>。而费先生从不受困和依赖“习惯于”的方法去从事学术思考和学术研究,总是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论证,从而力求在面对新的问题时能做出深刻而贴切地反映。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方法背后的源动力,既与费先生“亲师取友”的师生共同体中思想

[1]魏文一:《“刚”的人生态度与新知识分子-梁漱溟早期论中国文化的取向》,〔北京〕《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杨清媚:《知识分子的心史——从ethnos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4]费孝通:《从实求知》,〔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5]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6]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与方法论的相互启发有关,又根源于近世以来几代知识分子所践行的“志在富民”的理想信念地支撑。

### 三、负责任而走远道: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力

近世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必要视野和必须工具,但当产生于西方经验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被移用到中国现实中来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认同埋下了焦虑的根源。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深陷于“现代性认同焦虑”又遭遇到全球性“思维失效”进退维谷的艰难困境。面对西方文化,开辟未来世界文化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承继的思想基石是什么?回溯前文对费先生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费先生接续承继了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精神世界立足点和“负责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轴,并在“亲师取友”的学术共同体中汲取养分,在注重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成长的生存环境中获得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地持续不懈“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

费先生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三代现代知识分子,其在晚年时对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能力与成长寄托着深切的期望。费先生认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具备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sup>[1]</sup>的能力,并应在“行行重行行”中去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众自身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进而将其回归到知识分子的自觉与主体性上去倡导。在费先生学问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其忧思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的地位再认识,以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新情境中不同社群、国族之间如何实现“美美与共”的问题。费先生将中国文化置于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指出“现代化应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局面的过程”<sup>[2]</sup>。这是费先生为我们预见的全球时代的世界图景与社会新图景及社会生活秩序的新需要,而为了能够跟上这样的时代步伐回应复杂多变又不确定的新问题,费先生呼唤在新一代中能够出现懂得当“孔子”的人<sup>[3]</sup>。

费先生呼唤的新孔子应是能够在纵横捭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家纷争中,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文明的新互动情境与沟通需求中,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为从全世界看“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sup>[4]</sup>“找到‘和平共存共荣’的办法,并在新的世界秩序构建中保证每一个人安稳生活的意义。这位孔子还要善于研究发生在周围的变化,然而,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走在了我们思想的前面。全球化每天都在实现世界的内部化,但是全球化是否能够自动发展出一种合理的世界秩序?或者,全球化自动形成的世界秩序是否会是一种共在秩序?是否能够形成普遍接受的共同生活?这是不容乐观的问题”<sup>[5]</sup>。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无古人的新的实践,但我们对真正认识这个实践尚未做好应有的准备,就不得不接过前辈知识分子的接力棒,上下求索超越困境的道路。当代中国的青年后学与知识分子将如何传承和发扬以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如何接过老一辈学者托付的接力棒?我们的学习与创造性转化首先需要机智巧妙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要贯彻的“传统精神”、思想真谛、知识脉络及其支撑体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为我们不是简单在“回到”或

[1]李友梅:《费孝通对今天知识分子的期许——文化自觉,历史责任》,〔上海〕《社会观察》2010年第11期。

[2]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北京〕《读书》1997年第9期。

[3]黄志辉:《“新战国世纪”的“新圣贤”论——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世界秩序观》,〔北京〕《世界民族》2015年第1期。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5]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北京〕《文化纵横》2013年第4期。

“重返”中就能链接起一条“既能知晓来路,又能预见一个比较清晰的进路”的未曾断裂过的学术脉络与知识体系。我们实际上是在诸多“断层”中,探寻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内在理路。

首先,我们和大师之间是断层的,我们知识体系的习得更多的受到西方影响但我们却不具备如费先生那代人的清醒认识与反思能力。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以1949年作为中界,以五四和文革为历史中轴,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sup>[1]</sup>。晚清一代、费先生的老师们代表的“五四一代”及费先生代表的“后五四一代”可被视为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前三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50年代的大学生即“30后”这一代学人,“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与中学生即“40后”、“50后”、“60后”这一代学人以及“70后”“80后”这一代跨世纪的青年后学,构成了在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及整体素质上与前三代知识分子有很大“断层”的后三代知识分子<sup>[2]</sup>。后三代知识分子相较前三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上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打下的多是“西学”的基础,远不及前三代知识分子“中西一贯”的知识底蕴。

其次,我们在精神气质与整体素质上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与问题意识与特地历史条件下的人文世界大环境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立志自觉,体现在对“学以致用”传统的承继。费先生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贯彻在其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没有动摇过,因此其才能“一直在看书、看人、看社会,时时在思考、处处皆田野”,为解决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不断遭遇到的复杂多变的新问题,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与知识体系。相较前辈学者,我们远未在个人与社会历史中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我们对“从实求知”的理解和践行还远不深入,与基层社会生活现实间是有距离的;我们似乎总在既有学术评价标准与绩效考核的追赶中拼命“跑步”,而忘记在“散步中”在“行行重行行”的脚步中才能更好地思考;我们的身上还背负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地批判。

第三,我们欠缺甚至已经失去费先生所栖居的那种由大师、良师及益友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亲师取友”的师生共同体与学术思想的生存环境,为近世以来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知识结构与整体素质地接续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知识分子地承继与接力,攸关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而从费先生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其思想地成长有赖于其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因为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体,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若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虽然在总体上有悲观与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又总能陶醉其间,享受创造的乐趣,并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sup>[3]</sup>。

作为结语:“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轴,是知识分子群体接力前行的源动力。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成为不久的过去,当未来的人要求再次“回到”、“重返”时,是回到我们的当下,还是基于我们当下的“回到”、“重返”链接到更早的过去?在这样追随过去的学习当中,我们应该具备基本的反思能力和辨析能力,以便于将对过去的学习,始终建立在一种接近有质量和高度可靠性的基础之上。而从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近代中国三代知识分子那里,汲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为新一代的学人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究其根本在于我们如何建设新世纪的学术生态环境,为知识分子的成长构建起一个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惟其如此,才可能为“新孔子”诞生开辟出一个未来。

[责任编辑:方心清]

[1]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710.html>。

[2][3]钱理群:《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与民国相遇(序言)》,[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